魯迅散論

雪葦著

光華書店發行

魯迅散論

著者 魯迅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各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LUSHIUN SAN LUN
SIUE WEI ZHU

一九四八年四月
在大連印造
初版發行三千册

No. 170 D. 0001——3,000

幾句聲明：

雖然是出版這樣一本異常單薄的小册子，却是作者多年來的努力，也是作者引爲光榮的。只因能力薄弱，俗事牽纏，時間難長而成就却少。捫心自問，愧悔莫名！原來的計劃，尙有一篇以作者在『魯迅逝世十一週年紀念大會』（關東文協召集）上的報告爲基礎而寫的『魯迅先生的生平』，現以時間不夠，不能完成了。僅附錄一個較爲簡明的『年譜』（大體上根據許壽裳先生的改編），補此缺憾。『論魯迅先生的轉變』，原稿一時尙找不到，希望再版時能加入。

——作者。

目次

紀念魯迅先生（代序）……一
導師的喪失……二
論魯迅先生的『轉變』……缺
魯迅先生的寫作理論……二六
『野草』的『題辭』……三九
論『野草』……四五
魯迅先生年譜（附錄）……七

紀念魯迅先生（代序）

一

魯迅先生告訴了我們要怎樣堅決的戰鬥。

他說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歷史，無論改朝換代是來得怎樣的頻繁，但在人民，則不過只兩個時代：一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一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但是，『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註一）『倘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註二）他要我們有這樣高度的勇敢。

但是中國的這個舊社會，這種舊勢力，是經過了幾千年歷史的鍛鍊，擁有這麼長的反動統治經驗的，它是那樣的殘暴，却又是那樣的善於僞裝；是那樣的認眞，却又是那

樣的善於虛僞；是那樣的神氣，却又是那樣的『虛無』……。最多的是陰謀和暗箭，它是革命的死敵，但它又不來和你正大光明的『戰』，它的詭計是多端的（這個『東方的』日本帝國主義，也同有這樣的性質）。生在這樣的社會中而謀改造這社會的人們，就得有『聰明的戰法』。『聽說剛勇的拳師，決不再打那已經倒地的敵手，這實足使我們奉爲楷模。但我以爲尙須附加一事，卽敵手也須是剛勇的鬥士，一敗之後，或自愧自悔而不再來，或尙須堂皇地來相報復，那當然都無不可。』『否則，他對你不「費厄」（公道），你卻對他去「費厄」，結果總是自己吃虧，不但要「費厄」而不可得，並且連要不「費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費厄」，最好是首先看淸對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費厄」的，大可以老實不客氣；待到它也「費厄」了，然後再與它講「費厄」也不遲。』（註三）這樣，魯迅先生就主張『壕塹戰』的戰術。不然，『許褚赤膊上陣，也

註一：『燈下漫筆』。——『墳』，『全集』第一卷。

註二：『忽然想到』。——『華蓋集』，『全集』第三卷。

註三：『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墳』，『全集』第一卷。

就很中了幾箭，而金聖嘆笑他道：「誰叫你赤膊？」」（註四）

壕塹戰的戰術是最「韌」性的戰術，（註五）要有如「這樣的戰士」那樣澈底韌性的革命奮鬥的精神。不要輕浮氣燥，但也不要放鬆敵人，而要堅決的然而耐心和澈底的戰到「底」！「假使此後光明和黑暗還不能作澈底的戰鬥，老實人誤將縱惡當作寬容，一味姑息下去，則現在（一九二五）似的混沌狀態，是可以無窮無盡的。」（註六）

對於要做這樣一種「中國式」的戰士，自然要有合於這戰鬥原則的戰士底氣魄，也可以說修養。這個，首先就是要有澈底的「正視現實」的勇氣：「必須敢於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並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麼氣候。」（註七）「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是只能騙騙盲試官的。」（註八）其次，就要有實事求是的革命者的原則態度。能做出一點就做一點：不是如「智識高超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開導我們：生下來的倘不是聖賢、豪傑、天才，就不要生；寫出來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寫；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或者，至少能給我有更多的好處，就萬萬不要動！……」這其實不外就是一個不生、不寫、不動而已。（註九）應該能做一點就做一點，「有一分熱就發一

分光」，單是好高騖遠，公式，痛快，都是空洞而有害的；『例如只會「辱罵」，「恐嚇」甚至於「判決」，而不肯具體地切實地運用科學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釋每天的新的事實，新的現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實上亂湊，這也是一種八股。』也應『在掃蕩之列』。（註十）『當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進，不必忙於掛招牌。』（註十一）倘若離開了實際，『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

註四：『空談』。——『華蓋集續編』，『全集』第三卷。

註五：『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二心集』，『全集』第四卷；又，『兩地書』第一集，『全集』第七卷等。

註六：『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註七：『論睜了眼看』。——『墳』，『全集』第一卷。

註八：『革命文學』。——『而已集』，『全集』第三卷。

註九：『這個與那個』。——『華蓋集』，『全集』第三卷。

註十：『透底』。——『偽自由書』，『全集』第四卷。

註十一：『文藝與革命』。——『三閒集』，『全集』第四卷。

際，便即刻要擡碎了。』（註十二）

社會是這樣的社會，敵人是這樣一種敵人，聰明的戰法只好是『壕塹戰』，中國革命道路的曲折、複雜、艱難和長期的性質，都由是規定好了。在這樣的革命道路上走着的人們，於是就需要澈底的自我改造——要做到使自己這個『人』也符合於這目的和適合於這環境的自我改造。這就是，要具有這樣的品質：凡有和革命的利益要求不一致的成分，都加以澈底的丟掉，凡有爲了革命的利益而應犧牲的都能毫無保留的犧牲。『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的解剖我自己。』（註十三）而解剖自己更比解剖別人要更不留情面。（註十四）假如自己的血肉該喂動物，那喂就是，只要那是獅、虎、鷹隼。（註十五）

有這樣的品質，任何長年崎嶇的路程都能走、都能『通得過』了。

二

我們中國這個社會歷史所走的路，和歐洲國家所走的有些不同：我們是以封建社會的古物來迎接『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我們，中國的青年們所走的路，因而和

歐洲國家的青年所走的也有些不同：我們是從反封建的家庭婚姻問題或反封建的爭取『土地』問題而直接就走進馬克思主義的廣大的天地、社會階級鬥爭的思想領域的。——我們的『人的解放』尚未完成，便已同時走上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鬥爭的大道。但這裏，就需要一個特殊的教育方法與鬥爭方法，一架爲這歷史特製的橋樑，能引導剛從封建主義裏解放出來即能穩妥地直接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的特殊的思想橋樑；就是說，我們需要一個啓蒙的思想導師，但這個啓蒙的導師，已不能是十九世紀及以前歷史有過的那樣單純的『民主主義』的，而是要能使民主主義直接與社會主義結合、兼作社會主義的事業的，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這個『歷史的空隙』，就由魯迅先生來補滿了。這也就是魯迅留給我們的思想遺產的價值吧。我們從這裏，依靠它，使我們可以順利的學習怎樣使自己能穩步向前的從封建家庭衝出來，又能眞實的迎得上這社會主義的

註十二：『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註十三：『寫在「墳」的後面』。——『墳』，『全集』第一卷。

註十四：『答有恆先生』。——『而已集』，『全集』第三卷。

註十五：『半夏小集』。——『且介亭雜文末編』，『全集』第六卷。

『世界潮流』，能在這中國歷來歷史上稀有的激盪、變化迅速、曲折複雜的社會運動中還能結結實實的立得住脚跟，能够眞實的做成功個馬列主義者。像魯迅先生自己那樣，任何的激流變幻都搖撼迷惑不了他，始終一貫能穩站在革命的最前線，能爲這中國革命的事業眞實的服務到『底』。魯迅思想對於我們最寶貴的意義大概就在這裏吧。上節提出的輪廓，不過是我一點點粗枝大葉的、不完全的縮寫而已。

三

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故事——曾經有這麼一個生在落後省分的內地青年，衝出了封建軍閥的封鎖，跑出中原來追求『國民革命』了，但這時却已經是一九三〇年。當他到得武漢，他才明白了一切：『國民革命』已經變成吃人者的假招牌，這裏一切比他剛由憎惡而逃開的小軍閥天地也差不了多少：官兵也不平等了，對老百姓也『拉伕封馬』了，工人鬧着失業，屠殺更加厲害，黑暗更加甚了……。而這青年却只知道『國民革命』的覆滅，全不知道新的革命思想的展開，『共產主義』向來對於他是知識以外的存在，向他述說這天地似的變化的人，又不能告訴他這新的理想，這人也不過是一個跟着在這假

『國民革命』裏邊『鬼混』的一個小軍官罷了。他爲理想而來，但理想殘酷的破滅了；他是生長於封閉得那樣幾似的封建割據裏，因而新的那怕是一線的希望的曙光在他一點也看不到；前途茫茫，金錢無有，社會生活的經驗更缺乏，他想自殺了。但當他從悲苦中猛憶起魯迅先生這一段話的時候——

『君子若曰：「羊總是羊，不成了一長串順從地走，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君不見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終於也還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動不過是空費力氣而已矣。」

『這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這計劃當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見夫野猪乎！他的兩個牙，使老獵人也不免於退避。這牙，只要猪脫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了山野，不久就會長出來。』（『一點比喻』）

他就突然清醒而有力氣起來，在睜大淚眼凝視黑空中，他發出了這樣悲絕的戰叫：『就死也得衝死在任他（惡的社會裏去吧，死也得死在筋疲力竭的時候！』他由此還是迎面流到了上海，挺着他的身子去『頗』（拚命）了。後來他自然並沒有力絕而死：他迅速的

得到了新思想的救援，並成爲無產階級的勇猛的一員了。

還有類似的無數的故事。

而且，凡是由魯迅先生那裏哺育出來的（眞正是吃了他的奶的），都大抵帶着一致的特色：『平凡』些，結實些，堅靱些。——這正是與中國革命的長期與曲折性相一致的『人』的風格。

魯迅的思想，在過去已經哺育出大量的這樣的中國青年。……

魯迅先生逝世四週年紀念日。

導師的喪失

在最大危險的當前，
我們喪失了我們最良好的導師……

我們的喪失魯迅先生，比蘇聯人民的喪失M·高爾基，更要嚴重！

整個的蘇聯人民，早已經自己結束了他們悲慘的、被壓迫的生活，建立了一個燦爛的、自己的社會，每個人都伸直身子，立起認眞的做人。而且，由於新的創造的培養，他們的先覺的領導者已經是那麼多，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有着適應各項需要的繼承者。我們現在呢？整個民族正處在萬劫臨頭的懸崖上，幾千萬已經被魔鬼們所葬送，幾千萬正在陸續被葬送着。國內的情勢正是這樣的混沌，清晰的思想導師是這樣的缺乏。正是這樣萬劫臨來、痛苦奮鬥的今天，我們最偉大的思想導師——魯迅先生竟逝世了！這給予我們的悲痛，是不能拿和四個月前M·高爾基給予蘇聯人民的悲痛相比擬的！

自然，我們有什麼話可說呢？『……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也宣告了我

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然而D醫師的診斷却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 x 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死』）像這樣，還有什麼可以希冀的呢？還有什麼可以希冀的呢！……

一八四二年以後，不斷加速展開的突然破產和空前飢荒，結果在我們的社會層中孵化出整千整萬的『蝗蟲』。這般東西，從『破落戶』的窗戶間成群成群的飛出，普遍散佈於各個社會的角落，各各適應它底需要而佔據着一塊小地位：從『白相人』到『職業革命家』，從測字算命的『術士』到『革命文學家』，……用着各種不同的臉貌，操着各種不同的語言，做着各種各項的『職業』，假借各種卑怯和英雄、清高和無恥、墮落和前進的手段，來攫取他私人的『利潤』：或竊財害命，或出賣人頭，或『掙』革命的歷史地位做敲門磚、墊脚石，或欺恐嚇詐，在弱小者的身上營生。翻來覆去，『理論』，有，而且多着。『策略』，有，而且多着。但這陰謀的結果，則深深地毒害着民族生命的中心，玩弄和吸眞實的人民大衆的血液。他們是『做戲的虛無黨』，（『馬上支日記』——『華蓋集續編』）是『跟隨着獅子的狼』，『爲要飽咬他們的殘餘，並且，那頭獅

予害着病或受了傷的話，便要謀害它』。（R．羅蘭：『論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譯文新一卷一期）但他們還沒有狠那樣的『野性』和爽直，又類似灰老鼠或癩皮狗，而吃喝起來有時却比狠還更兇殘。他們無所謂『節操』，更無所謂有什麼『眞理』和『人民大衆』。他們可以東盪盪，西流流，今天一個樣子，明天又一付神氣！但當他們正在做着每付臉孔時，是認眞的。他們可以做『民族英雄』，也可以做『漢奸』；可以做神氣十足的『革命領袖』，也可以做最澈底的革命叛徒。這是中華民族解放鬥爭中最毒的毒害，最危險的敵人，他們眞具有使『人民大衆』陷入永劫不返的力量！

魯迅先生，就用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和這般東西鬥爭過來，到死的現在也在與之鬥爭。他以他自己決然相反的鋼樣的操守，堅韌惡辣的戰術，來進行這無與比並的偉大堅苦的鬥爭。他由此不唯做成了革命戰士的堅鋼煉成的模範，而且做成一切在前社會裡出身的、向光明的、無休息的人們之唯一可靠的引路者。通過了不同的時代而一直貫穿了他底一生的，是他的全面性的健康：生活上，戰鬥上，創作上，文化的移殖介紹上，甚至在文體及寫作風格上。

澈底的自我犧牲，精密的是非之辨，最堅韌的戰鬥操守，最聖潔的人格的典型——

『假使我的血肉該喂動物，我情願喂獅虎鷹隼，却一點也不給癩皮狗們吃。養肥了獅虎鷹隼，牠們在天空、巖角、大漠、叢莽裡是偉美的狀觀，捕來放在動物園裡，打死製成標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但養胖一群癩皮狗，只會亂鑽，亂叫，可多麼討厭！』（『半夏小集』——『作家』一卷二期）

這是魯迅先生的做人。

『實事求是』，切實而反誇張，進取而反盲動，澈底的現實主義的精神，一切都取決於實際內容的檢討，不爲任何的假面所掩蔽——

『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或「導師」罷，但那不是我。』（『寫在「墳」後面』——『墳』）

『必須敢於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並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麼氣候。』『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論睜了眼看』——『墳』）

『那種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別人爲「內奸」，爲「反革命」，爲「托派」，以至爲「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爲他倒巧妙的革殺民族的力量，不顧革命的大衆的利益，而只藉革命以營私。』（『答徐懋庸並關于統一戰線問題』——『作家』一卷五期）

這是魯迅先生的認識方法，他一貫的接近問題、把握問題的態度。

無情的掃盪一切各式各樣的市儈投機分子，永久的不妥協——

不管是什麼『慈善家，學者，文人，長者，青年，雅人，君子』以及『革命家』；不管他打着怎樣好的招牌：『學問，道德，國粹，民意，公義……』以及『前進，革命』；不管他是做假或裝死，辱罵或點頭招呼，『親善』或陰謀陷害；都『舉起了投槍』。只要他始終是敵人。（見『這樣的戰士』——『野草』）

不管他正當得意之際，或才一時失掉了主子，或還尚未找到主子，都要打；就是打落水裡，也『非又從而打之不可』。只要他始終是要咬人的狗。（『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墳』）

這是魯迅先生的戰鬥原則。

由這裡，我們得到了最健康的思想精神的教育，最寶貴的革命的遺產。由這裡，我們找着了中國民族革命解放鬥爭形態底最高的、最好的一面，整個鬥爭精神底聖潔的化身。至於魯迅先生的奠下中國文藝創作活動的最健康的基礎，現實主義的建立、寫作風格的創造、『雜文』——特殊的戰鬥文體的開拓，以及中國現代藝術基礎的培養、介紹翻譯等事業的建樹等，不僅僅做了我們底M·高爾基，而且還擴大的做了我們底A·普

式庚的事，和這比較起來，是還得列在其次的。

有些人想將魯迅先生的偉大意義局限在『文化運動』或『文藝運動』的範圍裡，而將他對整個革命鬥爭的思想指導作用忽視，抹殺或輕視他社會政治思想的寶貴內容及這內容的社會意義，那是決定地錯誤的。在我們底革命鬥爭的實際中，『正確理論』的接受往往不十分成爲困難，但每當這『接受』應用到實踐——執行的時候，便往往表現了非常的困難，甚至其結果會恰好相反。這爲什麼呢？是：是基本的認識能力不充分，『自立性』的不足够。換句話說，也就是『魯迅思想教育』的沒有得到足够的成功的結果：在『做人』的鍛煉，『自立』的根基的培養上；在認識方法的基本把握上；在戰鬥精神的原則之正確的理解上。『自立的』觀點沒有足够的把握，空架子擺去擺來是總會翻觔斗的，在目前，這還有原則意義的基本決定的內容。而在這點上，在『基本的』思想形態底特徵上，在約瑟夫·斯大林那里表現出來的，在魯迅先生這裡也同樣的表現出來。

然而，魯迅先生底『導師』的這姿態，離着被眞實地理解還很遠。

魯迅先生由最初（著名的是與『現代評論派』的鬥爭）到最近（一九二八，一九三六）所執行的鬥爭，都有着一個特點。這特點是：通過個人的活動去暴露和打擊某種社會思想和社會現象。這特點一貫的被保留下來，甚至完全沒有因爲何凝先生的評價而緩和。（見『魯迅雜感選集編序』第二〇頁）於是乎『私人！』『私人！』的呼斥聲，直擁擠到了他的死爲止。然而，問題是應當這樣來解釋的麼？未必吧？

這問題，何凝先生在一九三三年有過很好的說明。首先他說：

『……現在的讀者往往以爲「華蓋集正續編」裡的雜感，不過是攻擊個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不大知道「陳西瀅」等類人物的履歷，所以不覺得很大的興趣。其實，不但「陳西瀅」，就是「十章士釗（孤桐）」等類的姓名，在魯迅的雜感裡，簡直可以當做普通名詞讀。就是認做社會上的某種典型。』（『魯迅雜感選集編序』）

接着他又說：

『魯迅當時反對這些歐化紳士的戰鬥，雖然隱藏在個別的甚至私人的問題下，然而這種戰鬥的原則上的意義，越到後來就越發明顯了。統治者不能够完全只靠大砲機關槍，一定需要某種「意識代表」。這些代表們的虛僞和戲法是無窮的，暴露這些三「做戲的虛無主義者」（看『華蓋集

續編』——『馬上支日記』）也就必須有持久的韌性的鬥爭。』（同『編序』）

對於『一九二八的文藝論爭中魯迅先生的在這特點上的表現，何凝先生也承認，這是『經過私人問題去照耀社會思想和社會現象』。（同『編序』）

但如上的解釋還不够。魯迅先生並不是那種『只記得私仇私怨』的人，決不是那種用個人的仇恨來代替眞理的鬥爭、或者因爲先有『私人的仇恨』才去找尋眞理的鬥爭的人。假如不理解這點，我們無法理解他三十餘年來一貫的光輝奪目的歷史——他何時造下了這樣多的『私仇私怨』？——這固然是的。但僅根據這解釋，還不能找出這特點的『必然性』，不能理解魯迅先生這戰鬥形態的社會內容來。魯迅先生並不特別具有『愛好』由他的『私人』那裡去引起糾葛的『脾氣』。事實上是：他除了在迫切地必要的意義下，不亂去指名揭穿別人的什麼的。他自己早在一九三二年就非常明決的提示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在論爭。』（見『文學月報』第五、六期『通信』）

我們這社會，『做戲的虛無黨』特別多。『理論』是有着很多的，然大都僅是一個幌子；現在很認眞吧？而其實又並不如此。社會活動裡，要找幾部『老實』的理論，系

統的學說，除一以外，是不容易找到的。有的是『花頭』，或者簡直是『吃人』的號召。『花頭』僅用於遮掩『變化』的秘密，是『變戲法的手巾』。（『墳』——後記）在這裡，要捉牢『某種社會的典型』，就特別要通過這『變戲法者』的實際行爲，而且要具體的從他前後的行爲上去辨別，才好容易得手。這時『理論』的奧妙也就明晰了。因爲根本上就不是什麼『學理』在作怪。『通過個人活動去暴露某種社會思想和社會現象』的、這種鬥爭的特殊方式，就是在這社會特殊條件底下發育起來的。在魯迅先生的文章裏，我們也找得出這理由的充分的論據。這正是對一切『中國式』的假面具，一切盧僞招牌，一切抽象空論之以現實主義的、向其實際內容的檢討的必然的結果，是這必然結果的表現之一。

本來，問題的本身也並不在『涉及私人』或不『涉及私人』，而是在爲什麼必要去『涉及』。爲着問題的眞理的解決呢？抑是僅爲着『人身攻擊』。假如是爲了能更明晰的照見某種『社會的典型』，爲着必要的問題的解決，而不得不抓住牠『代表』的行爲來暴露它的話，那這樣做是必要的，也是正直的，且還特別有益。『涉及』就『反動』嗎？普列哈諾夫還『涉及』過密海洛夫斯基底『頭』；（見『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列寧

還『涉及』過主觀唯心論者們的『父母』呢。（大意是說：主觀的唯心論者們，將連他們是他們的父母所生的這回事也會加以『否認』的吧，因爲那是在他們底『感覺以外』存在的緣故啊！）

許多人會這樣說吧：魯迅先生是有着一個『嚴重的缺點』的，這缺點是他『理解力的遲緩』。這裏人家會指出一九二八的例，（或者甚至『目前』的例！但那則更加可憐了）。說：人家早已看到有提倡『革命文學』的必要的時候，他還在『荷戟獨彷徨』哩。客氣點，將這解釋爲他的『白壁微瑕』；更流行的，則斥爲他的『偏狹』、『頑固』。

這解釋又對麼？我們試來本質地分析一下吧：

第一，一九二八的論爭，並不表示魯迅先生比不上當時的『革命文學家』們知道有『革命文學』的存在。魯迅先生比他們知道得更早：『魯迅看見革命是比一般的知識階級早一二年。』論爭發生的當時，畫室就這麼的說過。（『革命與智識階級』——『中國文藝論戰』）事實上，魯迅先生從開始他的文學生活起，老早就注力研究北歐和東歐的

文學，且特別重視俄羅斯的文學。對舊俄及當時（直到現在也還是這樣）蘇聯文學情況是很熟悉的。（參看『革命時代的文學』、『革命文學』——『而已集』；『老調子已經唱完』——『魯迅在廣東』；『在鐘樓上』——『三閒集』；等等）他在北京時主編過的『未明叢刊』中，就出版有『第四十一』（蘇聯B·拉甫列涅夫）跟『文學與革命』，（托洛斯基）這些都是證據。但他爲甚麼不早拿到中國來主張呢？這當然是由于他在當時還不感覺到應用於中國現實的需要，或者說還沒有『穩定』這個理解。然而又爲甚麼不這樣呢？問題就在這裏了。事實如此證明：不是由於他的『盲目』或『偏狹頑固』或『醉眼陶然』，而是由于他對付問題的現實主義的反盲目輕浮的態度。他需要有了切合實際的認識，立得住自己的脚跟，自己對之能嚴肅的負責時，他才敢主張、號召。『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變鑽。』（『寫在「墳」後面』——『墳』）他害怕輕率的結果實際反葬送了自己的元氣，提高了敵人的氣焰。他不肯歪歷史的覆轍。——這，不唯對他自己是根本的說明，而且對他與當時『革命文學家』們鬥爭這事，也是根本的說明。因爲他們正就犯着這麼極可怕的『幼兒病』。他那時的諷刺和指責，不唯正中當時的病根，而且就在配合『一九三六

的場合』讀起來，也還有許多勃蓬着戰士底氣息，依然還充滿目前意義的教育的生命。（如『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文藝與革命』，『路』等——見『中國文藝論戰』）

然而，第二，他却不絲毫『冥頑不靈』和『意氣用事』。或者眞如×××當時所估計的：他『每天最關心的只是自己的毀譽，……要知道什麼人怎樣禮讚而什麼人怎樣失禮；而且一次觸了他的眼膜，……再也不會忘記，而且，一有時機，那便眞的睚眦必報了』。（『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中國文藝論戰』）或是如後來別的人所估計，他是那麼最可怕的『英雄主義者』：記私仇，弄威權。恰好相反：他對當時『革命文學家』的攻擊，雖照樣多是『通過個人』的，但却嚴謹的站在論爭的立場，從不浮囂一點，動點盲目的感情。這使得他和當時也是『反對』『革命文學』的人有決定的顯明的分別。跟梁實秋、柳絮輩固無論矣，就跟當時想緊踏着他的脚步的侍桁，中間都有着決定的原則上的分界。（參看『中國文藝論戰』）這『界』標立在那裏呢？那就是：『至多只嘲笑了革命文學的運動，（他沒有詆毀革命，也沒有嘲笑革命文學的本身）嘲笑了追隨者中個人的言動。』（畫室：『革命與智識階級』——『中國文藝論戰』）始終沒有越出一步，做過原則上的錯誤。這同樣是他光輝完整的歷史的一環，一貫的是作爲『浪

漫諦克的革命家的諍友』（何凝）而存在的一環。他對於自己，也一點也不逃避，現實的注視着問題，求更進步的學習，不斷的解剖着自己。這是魯迅先生在好多場合公開宣佈的，就在內心上，也沒有虛飾。第一，他不知道有所謂『聲名』的東西而『害怕』有人能眞正毀他。他是『那時候就等待有一個能操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我的。』（『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因爲這不只於他自己『有益』，最要緊是更於『革命文學』運動有益。其次，他也不因爲這樣的人『終于沒有出現』而自滿自足，高鳴得意。他相反的却更虛心起來，『自己來補足這個缺陷』。於是自己動手來翻譯『藝術論』，翻譯『文藝政策』……使人們對於『武器』有個眞正的理解，使『想操這刀子來狙擊我的人也能狙擊在致命的地方。』（大意，參考『「文藝政策」譯後記』）但是，他並不因此而在翻譯時賣弄機關，不容許因『打着了自己的痛處』而有絲毫的不忠實。『在翻譯時，到了打擊着我的敵人的地方，我就笑笑。到了打着自己瘡痕的去處，我就咬緊牙關忍受，依舊一字一句譯下去』。（大意，見『「文藝政策」譯後記』）在這樣澈底客觀的、眞實的眞理之追求中，魯迅先生終于實實在在的認識了自己『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三閒集』序言）結實的『從進化論最終的走到了階層論，從進取的爭求解放

的個性主義進到了戰鬥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何凝：『「魯迅雜感選集」編序』）

第三，由于這發展的結實和光輝，所以魯迅先生的更進一步，不得不是嚴肅的、現實把握的更進一步，切切實實地，十足能够自己對自己負責到底的更進一步，所以他就能與叫囂歪曲、亂殺亂砍者絕對兩樣！以前是做着『最好的工作』（畫室），現在一樣也做得更加好、更加偉大了。所以，當那些得意時氣焰萬丈，『居然自以爲獨得了工人階層的文化代表的委任狀』（何凝）的人們，到了眞正艱難辛苦的境地時，大都隱的隱、逃的逃、『轉向』的『轉向』、變賣的變賣，悄然了的時候，他則更光輝的顯出了他底存在，更加立得定、看得準、把得穩、做得勤了。人家正在害怕因他自己造出來的『代表資格』而要遭到殺頭，正因此感到被帶累和煩惱，用這『悲喜劇』的形式『下場』的時候，他則沉着的、本色的、不驕矜也不恐怖地立起來，鎭靜的表示：『我現在還是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人。』（『「兩地書」序言』）在人家捧着『聯合戰線』的招牌而在打算抹去自己底傳統的時候，他在統一戰線的擁護下，冷靜地熱情的誇耀：『左翼作家聯盟五六年領導和戰鬥過來的……』。（『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現實文學』第一期）更嚴重的提示：『用筆和舌，將淪爲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

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那末，到底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半夏小集』——『作家』第二卷一期）絲毫不因爲現在是『聯合戰線』了而就趕忙聲明自己的祖先本來就是『要不得』的。……

那末，我們逼近問題了：善與惡、良與劣、美與醜、正確與錯誤的分界在那裡呢？……或許魯迅先生是『遲緩』了，然而除了他，從來我們還沒有找着比他更善、更良、更美、更『正確』的典型，的工作，的活動。不『遲緩』的沒有，竟連比肩的都沒有呢。

寧亂殺亂砍，多造罪孽而少於建樹，那還不如『遲緩』一點的好吧。看：眞正的歷史要從那一頁寫起？眞正給予大衆鬥爭以實益的，主要是從誰的肩上負擔過來？……

在萬分艱難締造的時間，我們的導師死了！

這死後，是想得到的：一是借此來吸血，以爲可以更放心的、更凶狠的唬吸。這首先在這幾天來的『翻板偷印』上，就可以嗅出點來；一是將要開始他們對魯迅先生的『割勢』工作：曲解或支解。前此恨他『胡不早死』的，現在要十二萬分地『悲哀』，

哭喪着臉來『捧』他到高高的天空裡去罷。M·高爾基死後怎樣（在外國），我還不熟悉；不過資產階級學者、機會主義者們對付馬克思、恩格斯死後的手段，托派及其一流們對於死後的列寧的歪曲，這類的歷史教訓是了解一些的。然而馬克思、恩格斯在列寧的繼承下得到保持和光大；列寧在斯大林的奮鬥中也同樣發揮了他絕不可修改、不能修改的特質。我想，在魯迅先生的寶貴的獨特的戰鬥傳統下，無論任何的『野心家』也要『撲空』的吧？因爲這是『血寫的事實』啊！它將永永遠遠得到中國生的大衆的支持和眞實的繼承的。就一時不能更加以速力的發展，但最少最少也能頑强的保持和追隨。以後的歷史事實會證明，其實『戲子』們的打算是錯了的。

在最大危險的當前，我們喪失了我們最親愛的導師！今後我們更應當加倍的謹愼小心，來『管自己的生活』。但我們越發注意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們就越發記起我們先驅的導師所走過來的道路。也只有小心謹愼地踏着這偉大的足跡前進，才能够充分管理得好我們自己底『生活』！

安息吧！

呵，導師，

我們會踏着你底路向前，

那一天就要到來：

我們站在你的墓前報告你

報告你我們完成了你的志願。

一九三六，一〇，二十四日。晨五時。

魯迅先生的寫作理論

想用四五千字的筆墨，通過魯迅先生的作品去完整的解釋魯迅先生的寫作方法，在我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一時做得出來的事。在我，以爲假如我們能完全說明了魯迅先生的寫作方法，那就算說明了我國文藝寫作方法的戰鬥的傳統。這樣的事，是要準備給與相當的時間，更多的篇幅，跟着中國新文藝運動整個歷史的研究來進行的。我在這裏，僅企圖根據魯迅先生自己關於寫作問題的文獻，將他對於寫作的理解做一個比較系統的說明。但也只能是提綱的說明，在寫作技術的問題上，恐一時還是不能觸到。不過我相信：如果是我的能力所可及的話，將魯迅先生的寫作理論，在一般的輪廓上做出一個比較正確的說明，介紹了他在寫作問題上的基本主張，也還是必要。而且，對於我們現在是非常有益的。

跟其他的問題一樣，魯迅先生的寫作主張，在目前的寫作理論（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中，一樣站在很高的地位上，值得我們嚴重的來注意，深刻的來研究，並忠實的來

實踐的。跟其他部份一樣，魯迅先生在寫作問題上從頭到尾所抱的見解，是一貫充滿健康的；然而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被我們應用起來的見解。

魯迅先生一開始他的寫作生活，第一就堅決主張寫作是爲社會的理論。在魯迅先生看來，既不是『爲寫作而寫作』，也不是爲『自我的表現』而寫作，而是完全從社會的見解出發，爲了社會的解放和鬥爭而寫作的。在他看來，若不是這樣，寫作就簡直沒有絲毫的意義，他自己也毫無趣味來提筆了。他一貫的這樣主張着，實踐着，並且一爲的在這見解上跟和這相反的人們作激烈的論爭。他說：

『說到「爲什麼」做小說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啓蒙主義」，以爲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爲「閑書」。而且將「爲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我怎樣做起小說來』——。『南腔北調集』）

這是他在一九三三年說的，所以說『仍抱着十多年前』的主張云云。確實，他在一九二二年，在他的第一本小說集的『自序』裏，就這樣表白了他拋棄醫學轉入文學的動機。而這，是日俄戰爭那時（一九〇四——〇五）的事了。他說：

『……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那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看的便是來鑑賞這示衆的盛擧的人們。

『……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強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爲當然要首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吶喊』：『自序』）

然而，在那時，寫小說是不像現在也可以求『名』收『利』的。不准不如此，在那封建的中國學術傳統下，簡直認爲這是文人的末路，因而是爲『社會人士』所不恥的行業。魯迅先生自己說得好：『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爲文學家，所以並沒有人想在這一條路上出世。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擡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它的力量，來改良社會』。（『我怎樣做起小說來』）自然，現在『小說』是高踞在『文苑』的寶座裏了。但那時的情況，却把魯迅先生完全出發於社會的觀點的、澈底的、寫作底社會客觀的態度，刻劃得非常

明白。這特點，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也是客觀的、現實主義的最本質的寫作立場。

於是，從社會出發，爲了幫助完成社會的變革任務而寫作的他，在寫作方法上就必然成爲一個澈底的現實主義者。他嘲笑徐志摩的詭奇幻想；（一九二四年，『音樂？』——『集外集』）他打擊××××以爲表現實人生的藝術是『庸俗』的主張；（一九二四年，參看『故事新編』：『序言』（他嚴厲的批評創造社等的革命文學家們不敢正面現實的藝術的逃避、左傾公式的高調等。（一九二八年，『文藝與革命』；『「醉眼」中的朦朧』；——『三閒集』）他所要求的是『描寫現實』。並認爲要描寫現實，首先作家就要有『敢於正面現實』的勇氣。他說：

『多少偉大的招牌，去年以來，在文壇上都掛過了，但不到一年，便以變相和無物，自己告發了全盤的欺騙。中國如果有文藝，當然先要以這樣直說自己所本有的內容的著作，來打退騙局以後的空虛。因爲文藝家至少是須有直抒己見的誠心和勇氣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說不到什麼意識。』（一九二九年，『小小十年小引』——『三閒集』）

『總之，我的意思是：現在能寫什麼，就寫什麼，不必趨時，自然更不必硬造一個突變式的革命英雄，自稱「革命文學家」；但也不可苟安於這一點，沒有改革，以致沉沒了自己——也就

是消滅了對於時代的動力和貢獻。』（一九三一年，『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二心集』）

『問題重要的是在怎樣的看法。譬如別人寫跳舞場罷，我們也未始不可以寫。但我們的寫法就和他們的不同。主要的是在寫實。』（參看周文：『魯迅先生是並沒有死的』。——『中流』第五期）

但是，魯迅先生並不以爲『寫實』便是『記錄』。在他看來，一篇小說跟一則『新聞記事』不同。新聞記事只要按事記錄就行，而小說——一篇文藝作品，那就不這麼簡單，是要憑用作家藝術的手腕，經過事實的分析、藝術的概括、生動的描寫……才會成功的。他在這主張上，第一個極明確的批評了『標語口號』的寫作理論的謬誤。他說：

『美國的辛克來兒（Upton Sinclar）說：一切文藝是宣傳。我們的革命文學者，曾經當着寶貝，用大字印出過；而嚴肅的批評家又說他是「淺薄的社會主義者」。但我，——也淺薄——相信辛克來兒的話。一切文藝，是宣傳，只要你一給人看，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也不開口。那麼，用於革命，作爲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爲當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不必忙於掛招牌。「稻香村」「陸稿蓀」，已經不能打動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顧客，我看見也並不比「皇后鞋店」裡的多。一說「技巧」，革命文學家是又要討厭的。但我以爲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却並不全是文藝，正

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布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因爲他是文藝。』（一九二八年，『文藝與革命』——『三閒集』）

然而？現實的眞實的描寫應該怎樣來進行呢？——

『所寫的事迹，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爲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脚色。』（『我怎樣做起小說來』）

在一定的主題下把題材組織起來，不拘陷在粗糙不全的個別的題材下面。這是一。

『顯示靈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學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Dostoievsky）那樣的作者。他寫人物，幾乎無須描寫外貌，只要以語氣，聲音，就不獨將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體也表示着。……』（一九二六年，『窮人小引』。——『集外集』）

『……要寫文學作品也一樣，不但應該知道革命的實際，也必須深知敵人的情形，現在的各方面的狀況，再去斷定革命的前途。唯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了解過去，推斷將來，我們的文學的發展才有希望。』（一九三一年，『上海文藝之一瞥』。——『二心集』）

不停止在人物的表面，還要深入其內容；不在事實的現象上打轉，還應該透視進去，

暴露其本質。這是二。

『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但爲達到這希望計，是必須與前驅取同一的步調的，我於是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亮色。』（『自選集』：『自序』）

在現實題材的處理中，在表現上，對於現實的肯定部份——前途發展的光明的强調。這是三。

可是，『組織』不是歪曲；深入不是想入非非；『强調』也不是未來的虛造。那樣，是魯迅先生所堅決反對的。事實上，他是一個極嚴謹的現實主義者。如像，在上面所引的『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中，他就告誡人不要『硬造』革命英雄。又說：『選材要嚴，開掘要深，不可得一點瑣屑的沒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創作豐富自樂。』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一九三六年，『現實文學』第一期）中，他叫人不要『硬紮一個革命的尾巴』，來表示『革命』。特別是在一九二八的文藝論戰中，他不斷的發揮了寫作的不能『超時代』、超現實的主張。（『「醉眼」中的朦朧』；『文藝與革命』；『路』；『太平歌訣』；『創共大觀』……）

魯迅先生認爲寫作並不是一件可以隨隨便便的事情，這中間需要作家們拋去自己利己的觀念，虛心刻苦的學習，不斷的努力前進。然而他又不以爲寫作是高不可攀的事，要天生的才子們才有這資格。他不斷的打擊那般徒唱高調、亂殺亂砍、他叫做『輪板斧』的『批評家』。他尤其反對對於新作家的蔑視。他主張現實的學習，寫不出自然不硬要寫；（『答北斗雜誌社問』。——『二心集』，一九三一年）但只要想寫，那有什麼就可以寫什麼。（『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等）作品不是一寫就要『不朽』，作家不是一生下地就能『偉大』的。——

『近來對於青年的創作，忽然降了一個「流產」的惡讖，哄然應和的就有一大群。……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於舊狀況那麼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這麼疾首蹙額；於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於初興之事就這麼求全責備？

『智識高超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開導我們：生下來的倘不是聖賢、豪傑、天才，就不要生；寫出來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寫；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或者，至少能給我（！）有更多的好處，就萬萬不要動……

『孩子初學的第一步，在成人看來，的確是幼稚，危險，不成樣子，或者簡直是可笑的。但

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却總以懇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這第一步去，決不會因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澗人的路線而「逼死」他；也決不將他禁在牀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飛跑時再下地。因爲他知道：假如這麼辦，即使長到一百歲也還是不會走路的。』（一九二五年，『流產與斷種』——『華蓋集』）

寫作學習的『實事求是』的主張，也是魯迅先生一貫的主張。今年，他爲了對於田軍的『八月的鄉村』的求全責備，還大大的打擊着那般所謂『革命的批評家』們。（參看『夜鶯』第三期：『三月的租界』）而他在這主張下面的實踐（教育青年作家及藝術家），也是貫穿了他底一生，並在中國新文化建設中留下了非常驚人的偉績。

將如上的魯迅先生的寫作理論與現在國際的寫作理論相比，似乎也極平常：『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理論不是說，寫作的第一個前提條件是『寫出眞實來』麼？它不是爲了更廣泛的教育各種各樣的作家，主張現實的學習，反對『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理論的書呆子氣以及它的偏狹性，而强調『描寫現實』的意義，以『現實的努力表現』來求統一，以不斷的寫作實踐來求達到最高的寫作水準——唯物辯證法的去把握現實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理論，不是也同時批判着布爾喬亞的現實主義，批判着他們早期的

浪漫主義，將『現實』作爲動的、發展的、可以預見的（夢的現實）來解釋的麼？……這些都各各與魯迅先生的寫作主張吻合。但正因爲這樣，我們才看出魯迅先生的寫作理論的價值，才深深理解，在他這裡，就是寫作理論也是一樣堅實的、完整的和光輝的！

上面雖僅是提綱挈領的引錄，然而看那些引錄下面所註明的日脚吧。歲月的記錄證明：魯迅先生從一九〇六到一九三六，也就是從他文學生活的開頭到煞尾，都有着一貫的寫作理論的系統。而且這是無毛病的，也無矛盾的。這，對於那些老用着那一套油滑腔調，以及愛叫『轉變後的魯迅』如何如何，『轉變前的魯迅』又如何如何者們，同樣給予了一個極堅固的回答！自然，魯迅先生的寫作理論雖一貫，而却有發展；雖沒有內部冲突的矛盾，然而却有着粗精之別。但跟其他問題一樣，在寫作問題上的魯迅，也沒有在理論上走過岔路，是很明顯的。所以，既不背馳，又何來回『轉』？在『新青年』——文學研究會（一九一八——一九二七）的時期，文藝活動中，正迷漫着個人主義的寫作理論；然而他却沒有接受這些影響，相反，他是客觀的社會的『民衆主義』的。又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二的時期，文藝活動的主流，迷漫着機械論的、『標語口號』的寫作理論（一九二九——一九三〇）與『左』傾觀念論的、到處向作家索閱『正確的世

界觀』的寫作理論（一九三一——一九三二）；然而如上所見，他在這裡也沒有陷入過『歷史的錯誤』。他既反對離開『文藝』的狂叫；也堅決主張只有實際的寫作才能『正確』。與其左右爲難，不敢動筆，不如有什麼就寫什麼，能怎樣寫就怎樣寫，而在實踐的鍛鍊裏要求精進。當參加對『第三種人』的論戰時（一九三二），他大膽的（然而是正確的）向『第三種人』的蘇汶說：是的，你與其欺騙，與其做冒牌貨，不如你還是去寫你的吧。（『論「第三種人」』。——『南腔北調集』）

歷史一頁一頁的揭開，在寫作理論上，我們也同樣理解到他完整的偉大的光輝了！

（一九三六，十二，四日）

「野草」的「題辭」

魯迅先生的散文詩集『野草』，原來是有篇『題辭』的，而後來的『野草』裏，這篇『題辭』却不見了；『全集』出版時，竟也不見這篇『題辭』的下落，無論第一卷本書或第七卷（拾遺）。

然而，『野草』本來是有篇『題辭』的，就正是下面這個：

題辭

當我沉默着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爲我藉此知道牠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於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爲我藉此知道牠還非空虛。

生命的泥委棄在地面上，不生喬木，只生野草，這是我的罪過。

野草，根本不深，花葉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陳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奪取牠的生存。當生存時，還是將遭踐踏，將遭刪刈，直至於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我自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天地有如此靜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靜穆，我或者也將不能。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於友與讎，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

爲我自己，爲友與讎，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與朽腐，火速到來。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這實在比死亡與朽腐更其不幸。

去罷，野草，連着我的題辭！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魯迅記於廣州之白雲樓上。

這個『題辭』，爲什麼後來會被魯迅先生抽掉的呢？……

我初讀『野草』，本在一九二九年前後，但因爲那是在遠遠的『內地』，新書剛

「解禁」，而且路運極遲，讀的不是初版本便是再版本。那時年青，對於『野草』內含的思想，還沒有接受的能力，但那『題辭』，不知什麼原故，也許是裏面重復着『但我坦然，欣然……』的吧？倒是很留下了點印象，一直不曾忘記。後到上海，又似再讀過三版的『野草』（『野草』每版均有版期、版次、版數的記載），那封面已由『魯迅先生著』改成『魯迅著』了，而題辭仍在。這書不幸跟我一同遭受不幸，入了『三道頭』之類的手裏。俟後流放數年，再歸上海，更買五版的『野草』，展開一看，赫然沒了『題辭』，使我非常的驚奇，想這究竟是什麼一種因由？對于魯迅先生，這類事是不能不算特出的。可是一點可信的理由也不曾想出，只好放過。但從此記住：『題辭』之被抽，不始自四版，定始自五版。

按『野草』初版，當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初印一千冊；再版於同年八月，加印三千，封面均有『魯迅先生著』字樣，裏封面傍註着『烏合叢書之一』，末附『未名叢刊與烏合叢書』廣告，底面是方形的北新商標，均爲北新之『北京版』。三版完全改觀，改『魯迅先生著』爲『魯迅著』，其他均去不載，當爲北新之『上海初版』。北新遷滬在一九二七年，『野草』四、五版約印於一九二八——二九年間，正是大革命失敗，魯迅

先生定居上海，面着馬克思主義文學運動的潮流，與文學領域上的宗派主義、公式主義（八股）大戰，並創首計劃地介紹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於中國的時候。

後一點，便是現在我來談這問題的重要『線索』。

不過，先分析『題辭』的內容看看——

『題辭』第二段，說明『過去的生命』已死亡朽腐。這『過去的生命』，自然指的是『野草時代』的生命，就是說，在北洋軍閥黑暗統治下的那反抗掙扎的『游勇』底呼叫，已成爲過去；但作者自己是高興的，因爲那時曾經活過，擔負過戰鬥的使命。第三、四、五段，來證明這理由，說明過去成績小，是作者所道歉的；但這一點點，也曾經過鬥爭，遭着摧殘，直到朽腐的時候。而作者仍是高興的。第六、七、八段，說明『野草』可愛，那只能使野草產生並又仗它做裝璜（他們並沒有別的『文學』啊）的地面——黑暗者，則是不能恕的。並且說，『地火』（革命）即將冲出地面，燒盡這一切！雖然那時野草（廣義的）也會一樣的被燒掉，因爲既然是已在摧毀了黑暗統治的大時代裏，自毋需『野草』式的戰鬥了，自己也還是願意的，究竟大時代終于到來，毀滅了那般『僵屍的統治』。（他這觀點可參看『革命時代的文學』）第九、十、十一段，

則是說明：（一）現在自還不是大時代，但大時代就快來到，現刻正是過渡的時候。（二）自己呢，這時也就不能即得到大暢快，將來也難說（不見得便會被『優待』）；不過這是作者的實有，不能扯謊，欺騙，掩飾的，願於這時獻給過去的和未來的作證。（三）而這意思，也還是希望它的過去火速實現，不然，倒要證明它先前未曾完成過什麼任務了，那就更其不幸。……

如此這般，說明魯迅先生寫這『題辭』的時候，是曾飽滿地、熱情地從這種信念出發：（一）革命快冲倒一切，大時代快來了；（二）所以，自己在黑暗裏的戰鬥，也成爲『過去的』了，它的那種爭戰，將再無『生存』的必要；（三）爲此，自己即令這些『過去的』單身爲大革命在異地苦鬥的功績被大革命所抹殺，也不在乎。關聯着，『題辭』的風格，便是輕快的、熱情外露的，這在魯迅先生的作品中，也極少有。

而一切解決問題的因素，便在這裏。

魯迅先生的這一圖高興，樂觀，顯然是立即便上了一個大當：『地火』並未噴出，而是給出賣了！過去的高興，只顯得是可笑的。對于這次的上當，他感到極端的沉痛。（參看『通信』和『答有恒先生』）『野草』所號召的鬥爭和控訴，決不能就宣佈『死亡』，

因爲產生它的地面，仍舊加倍可惡的存在。但是，這決不是說，如或意以爲，魯迅先生抽去『題辭』的原因，特別是他要『轉變』，不願公開這個錯誤。不然，像魯迅先生那樣的巨人，『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既是錯，不必掩飾，也不會掩飾的。並且，沒有先料到大革命被出賣，誰都一樣，他又不是直接指導的人，況還曾以他的觀察，早先發過警號，遠高出於那些機會主義者的呢。（比如『革命時代的文學』）而『答有恒先生』和『通信』的永載『而已集』，也是鐵證。眞正的原因是：既如此，若仍讓『題辭』留在『野草』的前面，將會完全改變它的作用和性質，直接成爲繼續戰鬥的否定和控訴的非難。特別在當時（一九二八——二九），騙子屠夫正誑言着『過去』，而被犧牲的『阿斗』剛於萬險中着手創業，須力極揭穿這僞騙的時候。留着『題辭』，將不是自己的坦白，而是自己的束縛和誹謗。這種書生式的坦白，對于寫『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的先生，已是知其毫無價值了。『野草』仍須生存，故抽掉它，是完全必要和刻不容緩的。

——於是我便這樣想通了問題，一時高興起來，記之如右。

一九四二年十月，先生逝世六週年紀念日，寫。

論『野草』

——爲了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

一

『野草』，大概是魯迅先生作品中最薄的一本了。除去『題辭』，計二十三篇，字數不超過三萬。可是，完全是一本意義重大的書。

『野草』的寫作時間，與小說集『彷徨』同時，主要是一九二四、二五年間。就是，在五四革命運動低潮以後而大革命又還沒有到來。這時的魯迅，是『又經歷了一次同一陣營的戰友，竟有如是的變化』（大意）。他已獨個留在戰場上成爲『散兵游勇』之後，甚至如他的詩裡所說的，『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了。——自然，其時中國無產階級已開始有了它底參謀部，馬列主義已開始在中國滋長起來。但他在客觀實踐的步調上雖然一致，却還未主觀地與之直接結合起來，因此這一偉大後援的感覺，當時在他底

主觀上是尙未存在的。

大凡一個人，當他自己看來是處于孤立無援、『六面碰壁』底境地的時候，時代對于他底考驗的嚴酷，是再無以加之的了。因爲不啻是處在一個敵我力量絕對懸殊的決死戰鬥裡，自身底任何一個微小的弱點，均可以被伺隙的敵人誇大地暴露出來。這時來檢閱這支隊伍——這個人底品質，那是再精確分明也沒有了。然而，這種人類精神底特殊險惡的遭遇戰，往往是不易爲外人所得而深知的；但『野草』，就其特殊點說來，恰是魯迅處在這種遭遇下轉過來毫無掩飾地描述自己當時心境之陰影角落的一本書。所以，作爲研究我民族歷史上稀有的偉大思想家底品質來說，或作爲了解我民族在二十世紀這一偉大艱苦的時代如何考驗與製作它底兒孫來說，『野草』都有它底極爲寶貴的意義。

『野草』本文二十三篇，除『雹』（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好的故事』（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臘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篇；依我的意見，大約可以分成兩組。第一組以『過客』（一九二五年三月二日）爲首篇，下列是：

『希望』（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影的告別』（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死火』（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求乞者』（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墓碣文』（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頹敗線的顫動』（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死後』（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風箏』（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共是九篇，在數量上是比較少的。第二組以『這樣的戰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爲首篇，下列是——

『秋夜』（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淡淡的血痕中』（二六年四月八日）
『一覺』（二六年四月十日）
『復讐』（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復讐（其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狗的駁詰』（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失掉的好地獄』（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立論』（一二五年七月八日）

『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我的失戀』（一二四年十月三日）

共是十一篇，而『死後』也可以重列在這裡。

第一組主要是從心境底『陰影』的一側面來解剖自己；第二組，則主要是號召戰鬥及直接對于黑暗底攻擊。後一組，是前一組底內在精神之外在底積極的發揚，而其總色彩，則又是統一的。

內心底『陰影』一角的存在，乃在於他當時是處于『絕境』；但當魯迅處在這戰鬥的絕地裡時，就以這『陰影』的一角而論，他表現出的是怎樣一個人呢？這只要看首篇『過客』就明白了。首先，他是絕對不回過頭去投降的，你看這段對話：

翁。　我單知道南邊、北邊、東邊，你的來路。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許倒是於你們最好的地方。你莫怪我多嘴，據我看來，你已經這麼勞頓了，還不如回轉去，因爲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

客。　料不定可能走完？……（沈思，忽然驚起，）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裡去，就沒

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地主，沒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沒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我憎惡他們，我不回轉去！

——『野草』。七版本，四二——四三頁。

對于這個地主統治的社會，這是多麼決絕呵！我們該可以聽得到如金如石的聲音罷。

其次，無論前進的路是如何迷濛不清與自己已經是何等的困頓，他仍要作決不休息的前進。他這樣說：

客。是的，我只得走了。況且還有聲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脚早經走破了，有許多傷，流了許多血。（舉起一足與老人看。）因此，我的血不够了；我要喝些血。但血在那裡呢？可是我也不願意喝無論誰的血。我只得喝些水，來補充我的血。一路上總有水，我倒也並不感到什麼不足。只是我的力氣太稀薄了，血裡面太多了水的緣故罷，今天連一個小水窪也遇不到，也就是少走了路的緣故罷。

翁。那也未必。太陽下去了，我想，還不如休息一會的好罷，像我似的。

客。但是，那前面的聲音叫我走。

翁。我知道。

客。你知道？你知道那聲音麼？

翁。　那我可不知道。他也就是叫過幾聲，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就記不清楚了。

客。　唉唉，不理他，……。（沈思，忽然吃驚，傾聽着，）不行！我還是走的好。我息不下。……

……

翁。　你息不下，也就背不動。——休息一會，就沒有什麼了。

客。　對咧，休息……。（默想；但忽然驚醒，傾聽。）不，我不能！我還是走好。

翁。　你總不願意休息麼？

客。　我願意休息。

翁。　那末，你就休息一會罷。

客。　但是，我不能……。

翁。　你還是覺得走好麼？

客。　是的。還是走好。

……

（即刻昂了頭，奮然向西走去。）

——『野草』。七版本，四三——四四、四六——四七、四八頁。

所謂『聲音』，對于當時的他，只不過單純是個人信仰的一點鼓勵而已；所以這種戰鬥的心境（充分照見其對黑暗的決絕程度），就如『希望』裡所說的：即我這盾（希望）的後面還是空虛，我也要以這盾來抵抗空虛的暗夜之襲來！

即令自己完全成爲『散兵游勇』，但『還偏要留幾片鐵甲在身上』，還能依然堅持在戰場作堅決的、持久不斷的戰鬥：這已經是『鐵案如山』，成爲不可磨滅的史實了。現在的問題是：魯迅既處在這樣特殊的『絕境』裏，如何能發揮出如是高貴的品質，這般倔强的操守？

中國舊社會太黑暗無恥，而且太黑暗無恥得長久了；但中國人民爭取翻身的鬥爭也是最長久、最大量地付出代價、最英勇與決絕的。這在思想領域上自將要求其反映這種常是處在慘敗境地但常是屢仆屢起底性格的代表。我們當前與過去的舊社會的黑暗，常是黑暗到與它對立的人寧願做到『予及汝偕亡』以上，即是做到：『即令就只剩下我一個人，即令就是注定了我該永遠困死在你的手裡，但我也寧願堅持與你決戰終身。』——這便是月一組的首篇『這樣的戰士』之精髓。這是魯迅品質的實際，而我國的舊社會，也爲它自己安排了這種獨個拿起鶴嘴鋤來給它挖墳墓底『鋼人』的。這根據是：它

既可惡到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程度，則與它敵對者自也將倔强到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程度。由于舊勢力之長期的强大，人民仆地次數之多，自也難免反映出如『變節』這類問題之帶有社會的性質；但人民始終是屢仆屢起、且一次比一次聰明和有力的，所以，更要鍛鍊出比鋼鐵還堅固結實的戰士們來；豈止『十二月黨人』而已哉?!

當黑爾岑在巴黎大街上遭遇到六月事件（註一）的大冲突和大流血時，他是悲慘到這樣的地步：

『生活被燒成灰燼，屯在各種事變的深淵中，在公衆事業的漩渦裡失去了形色，屯變成了以自己爲中心而退回到青年時期的抒情性去，沒有青春，沒有信仰。依着這個燈塔的指引，我的船不能不碰着礁石破碎了，船沈沒。我活着，這是眞的。我保全了性命，但是，我失去了一切的東西……』

『我後悔爲什麼不接過那工人的槍留在障碍物旁邊呢？要是一顆偶然的槍彈打在我身上，我至少還可以帶着一點信念進入墳墓。』

註一：一八四八年的六月事件，爲法國資產階級所佈置，這一役誘殺與『剿滅』了數萬勞動人民。

——『一個家庭的戲劇』，三一、二六頁。

但當魯迅遇到類似的事件——甚至其情景更爲慘苦——時，他却是不驚叫也不悲哀，以深知不是『殺錯了人』而是『看錯了人』的心情，以清醒得有如麻木的面容說出：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險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空談』，一九二六年四月二日。

這便是魯迅底品質之特殊的地方。（註二）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希望』）這在歷史行程的特別階段裡，在個人特出的『絕地』遭遇裡，作用完全是積極的、戰鬥的，也爲我們這特定的社會性質底各條件所賦予的。解開這點，在理解魯迅『骨頭』底硬度上，便可以得到更深切些根據；在認識我們這時代所製作的人物上，也可以增進一層老老實實的見識。

二

但自然，『陰影終還是陰影』。

『陰影終還是陰影』，是不錯的，不過這肯語的本身，並沒有說明任何問題。適才

說過了，生在處于二十世紀環境的中國這樣國度，對于被長期擺在火線上考驗的人，其內心生活中，誰沒有過陰影？己身的幼弱，敵人的强大，內外環境的複雜，形勢變化的劇烈，誰能免去內心生活底一時的陰影？……那末，問題倒是在於這陰影的實際。我們就將『野草』的第一組文字作一個具體的分析吧。

『過客』，我在上面已經分析過了；現在主要來談談『過客』以次的其他主篇：『希望』、『影的告別』、『求乞者』、『死火』和『墓碣文』。

『墓碣文』是最令人認爲『虛無而陰沉』的，就先從『墓碣文』談起。

不錯，在這一組中，『墓碣文』是表現得最爲尖銳與最爲沉重的。我說它尖銳，是由于全篇貫滿了尖聲的反撥；我說它沉重，那是墓碣首先道出的是極大的空虛。

『……于浩歌狂熱之際中寒；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

註一：這是魯迅對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的北京慘案：段祺瑞在其執政府門前屠殺徒手作『和平請願』的愛國學生事件寫的。當時魯迅目擊此種行爲，連續作了幾篇哀悼與號召『需要以別種方法繼續戰鬥』的文章。這其所以比六月巴黎事件更爲慘苦，就在這被全付武裝者所敵對的，不過是徒手請願的學生——大隊的青年們。

與極大的沒可奈何，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創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後，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陳舊，本味又何由知？……』

這個，不能不令人感到極大的沉重。但從這沉重，並未生出輭弱，流出悲哀的眼淚：無可奈何下屈服，失去了自主。爲什麼呢？那就是，緊接『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的後面，呼出了『于無所希望中得救』。

『于無所希望中得救』，這是什麼呢？是擺脫，是奮起的起點。因爲，要先有所謂從舊壘（舊社會）中來，知道它很清楚，深深地理解了它毫無希望，然後再能生出兩個結果：一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爲惟有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二心集』序言）一便是，作起戰來，『反戈一擊，易致它的死命。』並且，爲魯迅之一生底特色的，無我的戰鬥人生觀，這裏也有着它的消息。即所謂：『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這是超脫了一切個人牽扯的戰鬥的歡喜。是說，只要我是在追求中死的，雖未達到目的（『抉心自食，欲知本味。』）而便消滅，也滿足於心了。

這樣，是不是在嘲笑人呢？『墓碣文』恰好是『這樣的戰士』的出發點。『墓碣文』不僅沒有什麼『虛無』，且與他的全部作品同調，沒有什麼絕望與喪氣。同一步調，同一色彩。

再是『求乞者』。

『求乞者』所道出的空虛心境，尤爲表面化：

『灰土，灰土，……

……

灰土……』

這是目『野草』爲『悲觀主義之結晶』者所最樂于引用的。然而，拋去了其他曲折的心理過程不說，這裏同樣也寫有：

『我將用無所爲和沉默求乞……

我至少將得到虛無。』

這話的後面，仍舊是站立着一個倔强而高大的身影。他是在說，他對于現實的社會仍不絕望，仍將『求乞』（行動），且是毫無裝作地『求乞』，且在主觀上有充分的準備：

即令（『至少』）無所收獲（『虛無』），也將滿足於自己的堅持行動（『求乞』）。——這樣的精神，那能不是無可限止的戰鬥的源泉！

至于『影的告別』，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裡，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裡，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裡，我不願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樂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隨你了，我不願住。

我不願意！

嗚乎嗚乎，我不願意，我不如彷徨于無地。』

一段，是覺得當前的一切：北洋軍閥的統治，社會的黑暗與其人物們的可恥（即『你們』），都不樂意；對他自己當時『游勇』的地位，沒有可以携手的、沒有大量可以結合的戰友，（註三）自然也感到不怡。充分表露着一無是處的、極端决絕與煩悶的心情。但是，

『我願意這樣，朋友——

我獨自遠行，不但沒有你，並且再沒有別的影在黑暗裡。只有我被黑暗沉沒，那世界全屬于我自己。』

要使黑暗由一己擔負（同歸於盡），不但沒有孤零的游勇，而且再沒有了一切不能不困於黑暗裏的人。這是寫出何等高度超越的自我犧牲底精神。就是『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墳』）裏說的：『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濶光明的地方去。』這不是『予及汝偕亡』式的戰鬥麼？

『死火』呢？

在冰谷中（讓環境把自身同樣凍結起來），將被凍滅（自身的戰士存在將被否定）；走出冰谷（擺脫環境的束縛），又將被燒完（奮鬥而死）。『怎麼辦呢？』他是有毫不含糊地答覆的：

註三：主要是他尚未在主觀上自己覺得工農兩大階級底偉大潛伏力量是與他結合着的。至于當時共產黨及其個別領袖的活動，他是知道的，他和李守常（大釗）同志還是好友。但他認爲，歷史用的是大算盤，只能像粗人算賬，四捨五入，記一筆整數的。（『聖武』）所以他的『寂寞感』仍不時或有，因此有這心境的波動。

『不如燒完！』

這與『我終于碾死在車輪底下，但我還來得及看見那車就墜入冰谷中』是一個合一的主意。『這樣的戰士』裏說：

『他終于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壽終。……無物之陣終于是勝者。
在這樣的境地裡，誰也不聞戰叫：太平。
太平……。
但他舉起了投槍！』

不都是決絕的戰鬥：『不如燒完』麼！

而『頹敗線的顫動』，正是寫着倔强，寫着對市儈的決裂。（七版本六五頁）且對她（老女人）底頑强的力量，作了極大的頌歌。（六六頁）

『希望』，是『野草』中寫得最爲美麗、最爲動人的了，但也是寫得最爲哀憤的。表達他的心情，與『過客』相同，正面而直接。所以是比較佔地位的，不如上述諸篇，只是有如倏忽之間的一意一影，一思一動。（註四）但也與『過客』相同，使我們能更具體與更全面地看出他底『絕境』遭遇的心情，並從這心情的返復過程中極爲明亮地照

出他所特具的戰士的品質。

首先，直喊出：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後，追溯過去——

『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後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

並解釋：

『豈不知我的青春已經逝去了？但以爲身外的青春固在……』

過去戰鬥的根據已是在于有『身外的青春』——即是說，已知自己個人的『衰老』是不足惜的：問題是在于客觀的大衆，而不在于個人的得失。接着便回轉來接觸到『現在』。現在是——

『何以如此寂寞？難道連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麼？』

這便發生懷疑了，於是感到 Petöfi 底絕望之詩的誘惑。但指出 Petöfi 之到底還要求助於

註四：『影的告別』是以『大睡到不知道時候的時候』來開頭，『死火』、『墓碣文』、『頹敗線的顫動』，均是以『夢』來提出問題。

希望：

『絕望之爲虛妄，
正與希望相同。』（註五）

而魯迅自己呢？倒是超出這一切，極爲憤發的：

『倘使我還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這「虛妄」中，我就還要尋求那逝去的悲涼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爲身外的青春倘一消滅，我身中的遲暮也即凋零了。』

勇氣勃勃，且堅持他以客觀的群衆爲依歸的原則。

甚至還進一步：

『我只得由我來肉搏這空虛中的暗夜了，縱使尋不到身外的青春，也總得自己來一擲我身中的遲暮。』

這就是說，即令這原則竟也失去基礎（即『縱使尋不到身外的青春』），也無所恐懼，因爲還有自己這存在可供戰鬥的犧牲。而且他還說：

『面前又竟至于並沒有眞的暗夜。』

這是多麼寬濶，多麼富厚的『戰爭後備』啊！

所以最後，他——魯迅的『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正是表現他底內心鬥爭過程的結果是高度的奮發：完全否定絕望！（註六）

如果我以上的分析不錯，未曾是『太主觀』，那末，這些作品，是都表明了：作爲一個澈底的民主主義者的魯迅，是不停息的在繼續着戰鬥而且提出戰鬥的要求。然而却於散了伙（五四後的分化）之後一時找不到結合的集團，未直接感到支持着他的偉大潛在力量之存在，四周的黑暗却又如此强有力地包圍着他與壓迫着他。這黑暗勢力的强固程度，又是當時全中國沒有人能像他一樣具有足够和正確的估計與認識。於是，在他內心的深處，不能不掀起某種程度的矛盾鬥爭，感到某種程度的寂寞，以及發現絕望與空

註五：可以看出，這兩句詩，即令在 Petöfi 本人底原意，也並不是在說明希望的絕望，而倒是在說明絕望之虛妄的。至少魯迅是這樣來了解。所以他註解說，彼多芬是在『終于對暗夜止步，回顧着茫茫的東方。』（對絕望止步，惦念起希望來。）因彼多芬底原意是否定希望的，所以這裡魯迅先生註解的開頭，用個『但是』。

註六：以上引用魯迅先生的文字，所有重點都是我加的。——雪。

虛的誘惑。——這都是我說的『陰影』。這些內心某時某角落的陰影，是存在過，是事實，也就是上舉各篇中曾淋漓盡緻地寫出了的。這並不奇怪，對於一個尚未在主觀上意識到背後能有廣大群衆支持着自己，而又超人地正確估計到反革命勢力之頑固程度的革命思想家，能在完全陷于孤立中（無論是主觀的或客觀的）仍要保有戰士底氣魄以屹立於戰場上，唯其『游勇』，這內心的曲折經歷是必然會要通過的；合乎自然，也合乎情理。如想抹去這個，當然是不對的。但這些陰影是屬于何等樣的性質，處于何等樣的地位呢？那這些作品也同時說明了：魯迅當時內心所有的鬥爭，出發于戰鬥，解決于戰鬥；魯迅是不屈服地（註七）把問題提出來，同時也不屈服地把問題一個個地加以解決。其意若云：『無論處于任何情況，碰見任何的問題，加諸我以任何的結果，……我的答復很簡單：都要對你們（黑暗）作永不屈服的搏戰。』

足見，即就是這『陰影』的本身，也同時放射出戰鬥的光輝來。這就是如他自己論十九世紀東歐作家底作品時所說過的話：『即令是頹廢和虛無，這也是戰士底頹廢和虛無。』何況這裏決不是什麼頹廢或虛無呢？這不過是一時的心之波動與心之一角的內在鬥爭吧了！而且，這正是說明：『野草』裏的這一組文字，正是他三十年如一日未停止

過的、屹立於最前線的戰鬥之基礎。有什麼東西能比預備失敗的前途而作捨命的鬥爭更爲堅決，有什麼東西能比知道自己的後面沒有任何支持而猶要堅決與黑暗作戰更爲英勇呢？

三

現在的問題是：爲什麼『野草』的『陰影』祇是『一時的心之波動與心之一角的內在鬥爭』？就是說，上篇所述，不過是就事論事吧了，至于要衡量它底位置，那這一切還遠遠不是一九二四、二五年魯迅思想的全貌；甚至不唯不是當時他的主要思想動態，而且只是當時他思想的內心轉動的一部分，極爲渺小的一部分。

這怎麼講呢？

我們試把魯迅與『野草』寫作同時的其他思想論文排比起來看看。

註七：其所以說『不屈服地』，是他並沒有兩手把自己的問題蓋住，而却訴諸大衆說：『我沒有問題。』但實際是已經向落後面妥協，一着着地在那裡向舊勢力却步。敢于公開提給大家，那就說明開始就有要求解決的勇氣了。

『野草』二十三篇的寫作時間，是從二四年九月到二六年四月。但是，二六年的作品（『淡淡的血痕中』、『一覺』）顯然用不着說明；不避重就輕，就以二四年下半年及二五年全年，作爲考察的對象。他這一年多的思想論文，作一個約略的統計，其情況如下：

『熱風』裡一篇

『望勿糾正』（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墳』裡十四篇——

『論雷峰塔的倒掉』（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說胡鬚』（同年十月三十日）

『論照相之類』（同年十一月十一日）

『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

『看鏡有感』（同年二月九日）

『春末閑談』（同年四月二十二日）

『燈下漫筆』（同年四月二十九日）

『雜憶』（同年六月十六日）

『論「他媽的！」』（同年七月十九日）

『論睜了眼看』（同年七月二十二日）

『從胡鬚到說牙齒』（同年十月三十日）

『堅壁清野主義』（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寡婦主義』（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這中間，大都是極爲結實的號召戰鬥的文字，特別是『論睜了眼看』（號召正視現實）、『燈下漫筆』（號召創造中國未曾有過的第三樣的時代）、『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號召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與反動勢力作澈底的鬥爭，不要上反革命欺騙、蒙蔽甚至假裝乞憐、悔過的當）等篇，是光照日月，永垂不朽的。（註八）

註八：如果要把這裡所列的文章都作說明，是不可能的。對于懷疑本文所開的篇目不可靠的同志，只好請去檢查原文。這中間對于各種『頹唐』『虛無』……說的反證是太多太多了。

此外，『華蓋集』三十篇：

『咬文嚼字（一至二）』（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
『青年必讀書』（同年三月十日）
『忽然想到』（同年三月十六日）
『論辯的靈魂』（同年三月）
『犧牲謨』（同年三月）
『戰士和蒼蠅』（同年三月二十一日）
『夏三蟲』（同年四月四日）
『忽然想到（五至六）』（同年四月）
『雜感』（同年五月五日）
『北京通信』（同年五月八日）
『導師』（同年五月十一日）
『長城』（同年五月十一日）
『忽然想到（七至九）』（同年五月）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同年六月十一日、十八日）

『補白』（同年六月、七月）

『許心雛龍』（同年十一月十八日）

『這個與那個』（同年十二月）

（以下是參加『女師大』的鬥爭四篇）

『「碰壁」之後』（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並非閒話』（同年五月三十日）

『我的「籍」和「系」』（同年六月二日）

『咬文嚼字（三）』（同年六月五日）

（以下是對北洋軍閥爪牙章士釗、陳西瀅們『現代評論派』鬥爭九篇）

『答K・S・君』（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碰壁」之餘』（同年九月十五日）

『並非閒話（二）』（同年九月十八日）

『十四年的讀經』（同年十一月十八日）

『並非閒話（三）』（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觀北大』（同年十二月十三日）

『碎話』（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公理」的把戲』（同年十二月十八日）

『這回是「多數」的把戲』（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對于參加『女師大』鬥爭的四篇和對『現代評論』派鬥爭的九篇，那是人人皆知的火熱的攻擊戰，用不着論證；上面的十七篇中，『忽然想到（十至十一）』與『補白』，寫作日期甚至與『墓碣文』同一天，但正與『墓碣文』相對照，竟作了『針鋒相對』的說明；（註九）『青年必讀書』、『戰士和蒼蠅』，也是極有歷史意義與戰鬥意義的文字：前者指示青年毫不遲疑的拋棄舊社會的思想傳統；後者歌頌許有些缺點的戰士，而鄙薄庸人的『完全』。『這個與那個』，則號召讀史與大膽行動。等等。

此外，還有『集外集』中二十三篇雜文：

『說不出』（一九二四年）

『又是「古已有之」』（同年九月二十八日）

『烽話五則』（同年）

『「音樂」？』（同年）

『我來說「持中」的眞相』（同年）

『通訊』（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詩歌之敵』（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關于「苦悶的象徵」』（同年一月三日）

註九：這兩篇恰好是聲援『五卅』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思想指導文字，站在『平民』的立場來批評一切妥協思想，號召正確的堅實持久的戰鬥。萬分不得已，略爲引證一點如次：『…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氣時，尤必須同時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還要永遠這樣的幹下去。』『…假定現今覺悟的青年爲二十（年齡），又假定照中國人易于衰老的計算，至少還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奮鬥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但是足以破滅這運動的持續的危機……有三條：一是日夜偏注於表面的宣傳，鄙棄他事；二是對同類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爲國賊，爲洋奴；三是有許多巧人，反利用機會，來獵取自己目前的利益。』『……即使所發現的並無所謂同胞，也可以從頭創造的；即使所發現的不過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戰鬥的。』（『忽然想到』）

『咬嚼之餘』（同年十月二十日）
『咬嚼未始「乏味」』（同年十月七日）
『聊答』（同年三月六日）
『報「奇哉所謂」』（同年三月八日）
『這是甚麼一個意思』（同年四月三日）
『「蘇俄文藝論戰」前記』（同年四月十二日）
『雜話』（同年四月二十四日）
『與高歌的通訊』（同年四月二十三日）
『與蘊儒的通訊』（同年五月六日）
『與培良的通訊』（同）
『一個「罪犯」的自述』（同年五月五日）
『田園思想』（同年六月十二日）
『流言和謊話』（同年八月五日）
『女校長的男女的夢』（同年八月六日）
『通訊』（同年九月一日）

這些大都是爭論或攻擊，——短兵相接的東西。

如此，總合起來，加上『野草』裡第二組的十一篇至十二篇，共是七十九篇至八十篇，約合『野草』中第一組文字的九倍至十倍！時間、地點、條件均相同，內容的比重却有如此大量的差異，不是說明那只是魯迅一小部分內心生活的波動，而是說明什麼呢？歷史上從沒有頹廢和虛無的人，並當他正是頹廢和虛無的當時，而却能作此火熱一般底戰鬥行動的，並且是這樣的豐富。特別這大量的論文，是熱烈的攻擊和號召，更非一些對舊社會的冷言冷語可比。這樣，反過來倒可以補足和證實上面的話：『野草』的內心鬥爭是完全勝利的，且正是『魯迅式』底戰鬥的內在底力的泉源。因爲，問題越解決得澈底，所以才戰鬥得澈底的。

如此，可以說明，這些空虛感與寂寞感，在魯迅的思想中，不是主面而是客面，不是正面而是反面，不是優勢面而是劣勢面，不是肯定面而是否定面。而且，其所以說是『波動』，是由于在他，這是隨時加以解決了的問題，他不過是把這些內心『煉獄』的過程毫不加以隱飾地記出來而已。有這個，才清楚魯迅每每的說話，爲什麼『發出來

的地方非常之深』（尙鉞）；有這個，才切實地理解，魯迅確實是『解剖自己並不比別人更留情面』（『答有恒先生』）；而且，絕對公開。

魯迅先生自己在『題未定草（六）』中，於指摘『眼光如豆』的選家常常在抹殺作者底眞象時，擧出蔡邕，擧出陶潛。對于蔡邕，選家只取他的碑文，遂成他僅是『典重文章的作手』；但他却有：『窮工巧於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湿，委嘉穀于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也是個有血性的人。對陶潛，選家多取他的『歸去來辭』『桃花源記』，論客常讚賞他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使得他在人們的心目中，只是一個飄逸出世的人物；但他却有：『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于牀前。』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塡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詩。並不是整天飄飄然的。之後，魯迅說：『譬如勇士，也戰鬥，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裏，尊爲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寃哉！』

那末，譬如『野草』，人常只取其中的某一小點，而尊魯迅爲『悲觀主義者』或『虛無主義者』，豈不更寃哉！不祇是『見樹不見林』，而且連『樹』也未曾仔細觀察：連

局部也未曾見得周到。

魯迅，唯其是經歷了如此內心思想之深刻的鍛鍊，方能够經得起當時環境對于他底殘酷的檢察。他思想的特色，其重大根源正是由于經歷過這樣不止一次的鍛鍊。這裏，『野草』是具有特別重大底意義的，因爲這最後澈底的解決了他底一切問題，『野草』成了他底無可攻破的『防禦陣地』，給他奠下在任何風暴中均能『立於不敗之地』的前提。對于這點，顯然連他自己也已明白了的：我發現他有意地在用這道陣地來抵禦任何歷史發展階段上突如其來的暴力。（註十）

『魯迅式』的戰鬥其所以成爲鋼樣的戰鬥，這是從中國特殊的環境裏所鍛鍊出來

註十：一九三三、三四年，對于把革命堅持在白區的人們，歷史對于他們掀起了一個極大的風暴。有許許多多的人被這個擊倒了。（我自然不是說那些叛徒，那是『露形』而非『擊倒』）三四年魯迅在『答楊邨人的公開信』裏便公開的說：『殺不掉，我就退進野草裡，自己舔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傳藥。』（『全集』第五卷，二二八頁）

的，決非十八、九世紀的啓蒙思想家們（舊民主主義時代的偉大思想家們）所可類比，——這是完全屬于另外一種情況下的另外一種人物。他的背景，是這個對幾千年來鍛煉得極爲强固的反動中國社會作『二十世紀式』的偉大民主改革之普遍與深刻的、堅苦卓絕的社會鬥爭。在這樣的戰爭中，每一個人將會各各受到猛烈而突然的巨大考驗，都得從各各的方面走進這座大『煉獄』場。魯迅，便是以他的道路完整地通過了這考驗的，而『野草』，便是他底這樣一座紀程碑；同時，也是我們這個社會、這個偉大而艱辛的民族，處在現代的環境裏，於何等嚴格的條件下製作它底偉大兒孫的一個深刻的紀錄。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脫稿。

魯迅先生年譜（附錄）

民國前三十一年　西曆一八八一年　一歲

八月　初三日，生於浙江紹興城內東昌坊口。姓周，名樹人（初名樟壽），字豫才。父伯宜，家庭爲小康之家（『四五十畝水田』）。母魯氏，外家住農村（安橋頭），一族皆農民，幼時常隨母太夫人前往，得在農村與農民接觸，影響極大。『故鄉』、『社戲』均寫此間，並見其與農民結合之情誼深厚。此種階級立場之轉化，先生也曾道及：『我生長於都市大家庭裡，從小就受着古書和師傅的教訓，所以也看得勞苦大衆和花鳥一樣。有時感到所謂上流社會的虛僞和腐敗時，我還羨慕他們的安樂。但我母親的母家是農村，使我能够間或和許多農民相親近，逐漸知道他們是畢生受着壓迫，很多苦痛，和花鳥並不一樣了。……後來……偶然得到一個可寫文章的機會，我便將所謂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陸續用短篇小說

的形式發表出來了。』（『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全集』第七卷，八一八、八一九頁）

民國前二十六年　一八八六年　六歲

是年入塾，從叔祖玉田先生初誦『鑑略』。

民國前二十四年　一八八八年　八歲

十一月　以妹端生十月即夭，當其病篤時，先生在屋隅暗泣。

民國前二十年　一八九二年　十二歲

正月　往『三味書屋』從壽鏡吾先生讀『懷鑑』。在塾中，喜乘間描畫，並搜集二十四孝圖等。但對『老萊娛親』與『郭巨埋兒』生反感。

十二月　三十日，曾祖母戴君卒，年七十九。

民國前十九年　一八九三年　十三歲

三月　祖父介孚公丁憂，自北京歸。秋，介孚公因事下獄，家產中落：『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自傳』）無何，回家，而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出入當質舖及藥店者三年餘。

民國前十六年　一八九六年　十六歲

九月　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後，家境益艱。以至『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不能受正式教育矣。

民國前十四年　一八九八年　十八歲

閏三月　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師學堂。（公費）

民國前十三年　一八九九年　十九歲

正月　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路鑛學堂，對於功課並不溫習，而每逢考試，輒列前茅。課餘讀譯本新書，尤好小說，時或外出騎馬。

民國前十一年　一九〇一年　二十一歲

十二月　路鑛學堂畢業。

民國前十年　一九〇二年　二十二歲

二月　由江南督練公所派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課餘喜讀哲學與文藝書，注意於人性及國民性問題。

民國前八年　一九〇四年　二十四歲

六月　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　往仙台入醫學專門學校肄業，成績爲中國留學生之冠。其學醫目的爲：『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吶喊』：『自序』）

民國前六年　一九〇六年　二十六歲

六月　中止學醫，而在東京研究文藝。關于此事，於『吶喊』之『自序』中曾敘述其經過云：『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課餘時事影片）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强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爲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

爲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全集』第一卷，二七一頁）此爲先生正式從事文學工作之開始，以及三十年中國思想建設工作之開始。

民國前五年　一九〇七年　二十七歲

是年夏，擬創辦文藝雜誌，名曰『新生』，但終未成功。後爲『河南』雜誌撰文。

民國前四年　一九〇八年　二十八歲

從章太炎先生炳麟學，加入『光復會』（『同盟會』之一支）。

民國前三年　一九〇九年　二十九歲

六月　歸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化學教員。是年輯印所譯（文言）外國短篇小說『域外小說集』二冊。

民國前二年　一九一〇年　三十歲

四月　初五日，祖母蔣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　任『紹興中學堂』教員兼監學。

民國前一年　一九一一年　三十一歲

九月　紹興光復（辛亥革命），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

十二月　寫成第一篇試作小說『懷舊』（文言）。（註：以上月分均係陰曆。）

民國元年　一九一二年　三十二歲

一月　一日，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員。

五月　航海抵北京，住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之『藤花館』，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八月任命爲教育部僉事。

民國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三十三歲

一月　『懷舊』發表於『小說月報』第四卷第一號。

六月　請假由津浦路回家省親。八月由海道返京。

民國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三十五歲

一月　刻『百喻經』成。是年公餘，蒐集並研究金石拓本。

民國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三十六歲

五月　移居會館『補樹書屋』。

十二月　請假由津浦路歸省。是年仍蒐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民國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三十七歲

一月　初，返北京。

七月　初，因張勳復辟亂作，憤而離職；同月亂平，返部。是年仍蒐集研究拓本。

民國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三十八歲

五月　先生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以『魯迅』爲筆名發表於『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展開中國革命的戰鬥的新文學史之第一頁。是年起，積極參加並領導中國新文化運動（『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以深刻思想與犀利筆鋒，從事作品及大量思想論文寫作。

民國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三十九歲

一月　十五日，『隨感四十一』發表於『新青年』六卷一期。

八月　買公用庫八道灣屋成，十一月移入。

十二月　請假經津浦路歸省，奉母偕三弟建人來京。是年仍搜羅研究拓本。

民國九年　一九二〇年　四十歲

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學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仍研究金石拓本。

民國十年　一九二一年　四十一歲

十月　『阿Q正傳』開始發表（連載）於北京『晨報附刊』。是年仍兼任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

民國十二年　一九二二年　四十三歲

八月　遷居甎塔胡同六十一號。

九月　第一小說集『吶喊』印成。

十二月　買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屋。

十二月　『中國小說史略』上卷印成。是年秋起，更兼任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及世界語專門學校講師。

民國十三年　一九二四年　四十四歲

五月　移居西三條胡同新屋。

六月　『中國小說史略』下卷印成。

七月　往西安講演，八月返京。

十一月　爲『語絲』週刊撰文。是年仍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及世界語專門學校講師。

民國十四年　一九二五年　四十五歲

八月　因教育總長章士釗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先生與多數教職員有校務維持會之組織，被章士釗違法免職。

十二月　第一論文集『熱風』印成。二十一日，『這樣的戰士』發表於『語絲』第五十八期。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中國大學講師，黎明中學教員。仍爲『語絲』撰文，並編輯『國民新報』副刊及『莽原』雜誌。

民國十五年　一九二六年　四十六歲

一月　女子師範大學恢復，新校長易培基就職，先生卸郤職責。教育部僉事恢復，到部任事。『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發表。（作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三月　『三一八』慘殺案後，避難入山本醫院、德國醫院、法國醫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論文集『華蓋集』印成。

八月　離北京去厦門，任厦門大學文科教授。

九月　第二小說集『彷徨』印成。『小說舊聞鈔』印成。

十二月　辭厦門大學職。

民國十六年　一九二七年　四十七歲

一月　至廣州，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

二月　往香港演說，題爲：『無聲的中國』；次日爲：『老調子已經唱完！』

三月　黃花節，往嶺南大學講演。同日，移居白雲樓。

四月　至黃埔政治學校講演，題爲：『革命時代的文學』。　十五日，赴中山大學各主任緊急會議，營救被捕學生，無效，辭職。

七月　演講於知用中學及『學術講演會』，題目爲『讀書雜談』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論文集『華蓋集續編』印成。

十月　抵上海。八日，移寓景雲里二十三號，與番禺許廣平女士結婚。　滬上

學界聞先生至，紛紛請往講演，如勞動大學，立達學園，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大夏大學，中華大學，光華大學等。散文詩集『野草』印成；散文集『朝花夕拾』印成。

十二月　往暨南大學講演，題爲『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又，應大學院（即後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之聘，任特約著作員。『唐宋傳奇集』上冊出版。

民國十七年　十九二八年　四十八歲

一月　論文集『墳』印成。爲『北新月刊』譯『近代美術史潮論』及主編輯『語絲』。『唐宋傳奇集』下冊印成。

五月　往江灣實驗中學講演，題曰：『老而不死論。』

六月　主編之『奔流』創刊號出版。翻譯『蘇俄的文藝政策』開始連載發表。

十一月　論文集『而已集』印成。

民國十八年　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歲

一月　與王方仁、崔眞吾、柔石等合資印刷文藝書籍及木刻『藝苑朝花』，稱

『朝花社』。

五月　十三日，北上省親。並應請至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第二師範學院、第一師範學院等校講演。

六月　五日，回滬。爲『水沫書店』主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先生年來自譯之『蘇俄文藝政策』，普列哈諾夫『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藝術論』、『文藝與批評』等，均收入此叢書內。

九月　二十七日晨，生一男。

十月　一日，名孩子曰海嬰。

民國十九年　一九三〇年　五十歲

一月　『朝花社』結束。主編『萌芽月刊』出版。

二月　『自由大同盟』開成立會，爲發起人之一。

三月　二日，『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爲發起人之一。會上發表意義重大之演說：『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十五日，『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發表於『萌芽月刊』第三期。同月，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請國民黨中

央及國民黨中央政府通緝先生。

四月　『自由大同盟』被嚴壓，先生離寓避難。同時牙齒腫痛，全行拔去，易以義齒。

五月　十二日，遷入北四川路樓寓。

八月　往『夏期文藝講習會』講演。

九月　爲賀非校訂『靜靜的頓河』畢，過勞發熱。　十七日，在荷蘭西菜室，赴『左聯』發起之先生五十歲紀念會。

十月　四、五兩日，與內山完造同開『版畫展覽會』於北四川路『購買組合』第一店樓上。

十一月　改訂『中國小說史略』十四、十五、二十一等三篇。

民國二十年　一九三一年　五十一歲

一月　二十日，柔石被捕，先生離寓避難。　二十八日，回舊居。

二月　梅斐爾德『士敏土之圖』印成。

三月　先生主編『左聯』機關雜誌——『前哨』出版（第二期起改名『文學導

報』）。

四月　往同文書院講演，題爲：『流氓與文學』。又往『社會科學研究會』與『文藝研究會』演講『上海文藝之一瞥』。

八月　十七日，請內山嘉吉君教學生木刻術，先生親爲翻譯，至二十二日畢。

二十四日，爲一八藝社木刻部講演。

十一月　翻譯蘇聯A·法捷耶夫長篇小說『毀滅』印成。

十二月一主編『十字街頭』（工人讀物）旬刊出版。

民國二十一年　一九三二年　五十二歲

一月　二十九日，『一二八』事變，先生在火線中，次日避居內山書店。

二月　六日，由內山店友護送至英租界內山支店暫避。

四月　編一九二八及二九年論文，名曰『三閒集』；又編一九三〇至三一年論文，名曰『二心集』。約至六月印成。

五月　自錄『譯著書目』。

十一月　九日，因母病赴平。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學、輔仁大學、北平大

學、女子文理學院、師範大學、中國大學等校講演，題爲『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革命文學與遵命文學』等。

民國二十二年　一九三三年　五十三歲

一月　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權保障同盟會』。被舉爲執行委員。

二月　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慶齡宅歡迎蕭伯納。

三月　『兩地書』印成；『魯迅自選集』出版。　二十七日，移書籍於狄思威路，租屋存放。

四月　十一日，遷居大陸新邨九號。

五月　十三日，至德國領事館爲法西斯蒂暴行遞抗議書。

六月　二十日，楊銓被刺，往萬國殯儀館送殮。時有先生亦將不免之說。或阻其行，先生不顧，出不帶門匙，以示決絕。

十月　先生編序之『一個人的受難』木刻連環圖印成。　又，短論集『僞自由書』印成。

民國二十三年　一九三四年　五十四歲

一月　『北平箋譜』出版。

五月　論文集『南腔北調集』印成。編序之『引玉集』（木刻）印成。

八月　主編之『譯文』創刊號出版。三十三日，因熟識者被逮，離寓避難。

十月　『木刻紀程』印成。

十二月　十四日，夜脊肉作痛，盜汗。病後大瘦，義齒與齒齦不合。短論集『准風月談』印成。

民國二十四年　一九三五年　五十五歲

二月　『集外集』印成。

四月　『十竹齋箋譜』第一册印成。

六月　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並作『導言』畢，印成。

民國二十五年　一九三六年　五十六歲

一月　肩及脅均大痛。二十日，主編之『海燕』半月刊出版。

二月　歷史小說『故事新編』印成。

三月　二日，下午驟患氣喘。

五月　十五日，再起病，醫云胃疾，自後發熱未愈。　三十一日，史沫特萊女士引美國D・醫生來診斷，病甚危。

六月　從委頓中漸愈，稍能坐立誦讀。可略作數十字。　短論集『花邊文學』印成。

七月　先生編印之『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出版。

八月　痰中見血。

九月　編校『海上述林』印成。

十月　稱體重八十八磅，較八月一日約增二磅。能偶出看電影及訪友小坐。八日，往青年會觀第二回『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十八日，未明前痰作，氣喘不止，延至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逝世。

遺著

『且介亭雜文』，論文集。一九三七年五月（？）印成。

『且介亭雜文二集』，論文集。一九三七年五月（？）印成。

『且介亭雜文末編』（許廣平編），論文集。一九三七年七月印成。

『魯迅全集』二十卷（許廣平編），一九三八年六月印成。

『魯迅書簡』（八百餘封，許廣平編），一九四六年十月印成。

『日記』（民國元年至二十五年逝世前），未印。